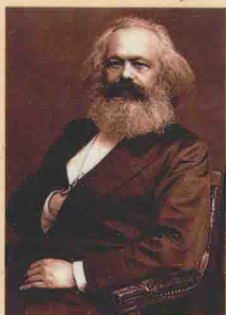




今日马克思主义  
研究丛书

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  
研究系列



吴苑华◎著

The China's Road From the  
World System Theory

# 世界体系视野中的 中国道路

——以沃勒斯坦、阿瑞吉、弗兰克  
和阿明为例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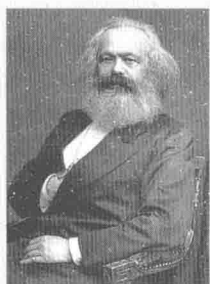


今日马克思主义

研究丛书

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

研究系列



吴苑华◎著

The China's Road From the  
World System Theory

# 世界体系视野中的 中国道路

——以沃勒斯坦、阿瑞吉、弗兰克  
和阿明为例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体系视野中的中国道路:以沃勒斯坦、阿瑞吉、弗兰克、阿明为例 / 吴苑华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4

(今日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ISBN 978-7-201-10270-2

I. ①世… II. ①吴… III.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76115号

## 世界体系视野中的中国道路

SHIJIE TIXI SHIYE ZHONG DE ZHONGGUO DAOLU

作者 吴苑华

---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mailto:tjrmcbs@126.com)

策划编辑 王 康  
责任编辑 林 雨  
封面设计 卢炆炆

印 刷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8.75  
插 页 2插页  
字 数 330千字  
版次印次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6.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022-23332469)

本书谨献给我的夫人李娟女士！

2015年度福建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

《世界体系论视野中的“一路一带”研究》

(项目编号: FJ2015A010) 前期成果

2013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世界体系视野中的中国道路论——以沃勒斯坦、阿瑞吉、弗兰克、阿明为例》

(项目编号: 13YHQ014) 成果

2012年度福建省社科规划基金一般项目《世界体系视野中的中国道路理论研究——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探索》

(项目编号: 2012B067) 成果

2011年度华侨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国家社科基金培育计划专项项目《乔万尼·阿瑞吉的中国崛起论研究——世界体系理论的新探索》成果

# 目 录

## 第一章 导 论 / 1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2
- 第二节 四个概念的清理 / 9
- 第三节 四位学者的中国道路论 / 20
- 第四节 四位学者理论的特色 / 48
- 第五节 四位学者理论的关系 / 67
- 第六节 四位学者理论的影响 / 83

## 第二章 沃勒斯坦的中国道路论 / 91

- 第一节 “俸禄制”社会模式 / 92
- 第二节 民族民主革命模式 / 100
- 第三节 今日市场经济模式 / 108
- 第四节 理论品质 / 117

## 第三章 阿瑞吉的中国道路论 / 126

- 第一节 传统国家市场经济模式 / 126
- 第二节 现代国家市场经济模式 / 137
- 第三节 中国道路的特质 / 150
- 第四节 中国道路的意义 / 161
- 第五节 理论品质 / 175

## 第四章 弗兰克的中国道路论 / 184

- 第一节 中华帝国兴起之径 / 184
- 第二节 中华帝国衰落之因 / 194
- 第三节 中国当代复兴之路 / 199
- 第四节 理论品质 / 210

第五章 阿明的中国道路论 / 229

第一节 封建社会的纳贡模式 / 230

第二节 毛泽东时期社会主义模式 / 240

第三节 当代国家资本主义模式 / 252

第四节 理论品质 / 259

结束语 / 268

参考文献 / 283

后 记 / 297

## 第一章 导 论

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复兴道路,是极为艰巨的任务。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摘自胡锦涛《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摘自胡锦涛《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也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

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

——摘自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北京共识”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对象和热门话题。乔舒亚·库珀·雷默、曹天予、阿里夫·德里克、托马斯·海贝勒、苏南达·森、阿马蒂亚·森、费正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郑永年、乔万尼·阿瑞吉、萨米尔·阿明、约翰·奈斯比特和多丽丝·奈斯比特、大卫·施韦卡特、大卫·哈维、托马斯·罗斯基、马里奥·特朗梯、约翰·特班、滨武下志、伊滕诚等国外著名学者,从不同角度讨论过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和经验,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为理性地把握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之道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其中,作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乔万尼·阿瑞吉、萨米尔·阿明、冈德·弗兰克在这方面的思考尤其引人注目。四位学者在世界体系视野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运用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问题的研究,系统地探索了它的演变特征及规律性内容,创立了“世界体系视野中的中国道路理论”,并且提出了许多原创性见解,不仅深刻化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道路的本质内涵和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体系视野中的中国道路理论”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事实上,沃勒斯坦、阿瑞吉、弗兰克和阿明的著作和理论早已被介绍到中国,为中国学者所知悉。可惜的是,国内学术界对他们理论的研究状况并不十分满意。从总体上看,沃勒斯坦的理论获得中国学者比较多的关注;阿明数次到中国讲学,引发了中国国内学者的研究兴趣,但是关于他的理论的研究也没有形成规模化成果;弗兰克和阿瑞吉的理论迄今(除了笔者有过相关研究以外)还没有出现规模化研究。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四位学者的中国道路理论被国内学术界有意无意疏忽,也就不足为怪了。毕竟四位学者对中国道路的历史变迁和现实状况作了广泛、深入,且有创见的思考,尤其是批判性地反思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种种问题(比如社会两极分化、生态危机、道德滑坡、官员腐败、重复建设和低水平建设、意识形态领导权等)的实质和深层根源,从这一意义上讲,他们的中国道路理论具有不可忽

视的研究价值和启示意义。

## 一、研究价值

那么,世界体系视野中的中国道路理论具有什么样的研究价值?我们认为,以下四个方面既是主要的也是最需要关切的内容。

第一,探索世界体系视野中的中国道路理论,有助于清理时下学术界关于中国道路的种种复杂认知,深化中国道路的理论探索。

在国内,学者们的兴趣是浓厚的,总体看大致表现为四种情形:其一,学者们热衷于对“中国道路”“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的概念内涵之争论,甚至不少学者纠结于谁优谁劣。其二,学者们比较多地反思了毛泽东时期的中国模式。多数学者认为这个时期的中国虽然取得了不小的历史进步,但是照搬了“苏联模式”;不过,也有部分学者能够正面评价毛泽东时期的中国模式,提出这个时期开启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为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发展基础。其三,学者们对当代中国发展道路作了广泛思考。绝大多数研究成果能够积极地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内涵、时代特征及历史成因,但是缺乏深度的批判性反思,尤其未能从世界历史进程上批判性地反思当代中国发展模式的得失。其四,少数学者从现代化发展角度界说中国道路,提出中国道路实质上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深入地探索了这条道路的合法化基础、演变特征及价值。

在国外,学者们的兴趣也表现出四种情形:其一,争论当代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他们承认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就,成功地推进了当代中国发展,相信当代中国发展有一个发展模式,不过少数学者认为这个模式是社会主义的,更多的人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其二,争论毛泽东时期的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的还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多数左翼学者认为毛泽东时期的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右翼学者指责它是封建专制主义发展模式,这些指认都不同于我国学者将它等同于“苏联模式”。其三,国外学者围绕“中国模式”“北京共识”或“中国经验”概念展开中国道路的争论,多数学者倾向于中国模式概念,少数学者倾向于北京共识或中国经验。其四,不少国外学者超越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中国道路理解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并与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作比较,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经验之“中国元素”。

与以上学者相比较,世界体系视野中的中国道路理论反倒包含了某些特色和优势。其一,从中国历史总进程上深入探索中国道路的历史传承、形态演化、发展规律和本质内涵等内容,揭示中国道路得以形成的优势基础和条件,包括独特的发展思路、合理的指导思想、丰富的发展资源等。其二,他们以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深入探索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及其对历史唯物主义当代理论创新的价值,尤其探索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社会发展理论所作的创新。比如阿瑞吉,曾经提出中国走了一条“无剥夺的积累”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为“后发”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和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发展经验。其三,从世界历史角度深入探索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界影响力,预测性地提出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对未来世界的走向可能产生重大影响。比如,四位学者都曾提出未来世界的发展重心从目前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地区移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

在总体上看,世界体系视野中的中国道路理论具有视野的广泛性、内容的丰富性、观点的原创性、认识的深刻性和理论的完备性等特征,这些都是其他学者在相关问题的思考上所难以比拟的。可以说,世界体系分析派的四位学者(以下简称“世界体系分析派学者”)对中国道路的思考,不仅探索了它的历史演变特征和本质内涵,而且分析了它的特色和优势及价值。这就启示我们,努力探索世界体系视野中的中国道路理论,揭示其积极的理论内容,能够深化中国道路研究,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性,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第二,探索世界体系视野中的中国道路理论,有助于完整地理解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涵和理论特征。

作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重要的新理论、新思潮,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至今没有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甚至有人还质疑这一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可能性。其原因可能有许多,而直接原因则是人们至今对它知之甚少。在我国学术界,大多数人都知道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理论,甚至不少人对这两种理论进行过一定程度的研究,可是对“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却少有人展开系统性研究。正如笔者在《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以沃勒斯坦的学说为切入点》中所说,目前,国内从事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理论研究的绝大多数学者不属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领域,他们往往隶属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受其学科

理念、视界和方法制约,难以觉察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理论中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虽然这种情况可以谅解,但不可助长。无论我们的研究状况怎样,都不可以忽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存在,虽然它是一个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无可置疑的是这一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许多前沿问题上有过广泛、深刻的思考,形成过系统的原创性成果,对于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价值。

就中国道路问题来说,它的研究也是既系统又有思想深度,不仅推进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而且创新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中国道路的问题域、阐释路径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探索世界体系视野中的中国道路理论,能够为深入探索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提供十分有益的理论资源,激发人们从事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情和浓厚兴趣,更重要的是创新和丰富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形态。

第三,探索世界体系视野中的中国道路理论,有助于推进人们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坚定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自信。

有人可能质疑这一说法。在他们看来,世界体系视野中的中国道路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存在直接关系,更何况西方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直存疑,且沃勒斯坦、阿瑞吉、弗兰克和阿明也在中国道路理论中对它有过存疑。人们应当知道,存疑不等于完全否定。世界体系分析派学者有存疑,是因为他们的质疑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某些具体做法与西方国家的做法相类似,还质疑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和困境也类似于西方国家过去出现的问题和困境,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当代中国照搬西方经验和方法、重走西方老路的“辩护词”。当然,四位学者的“存疑”并不是“怀疑一切”而是有目标地怀疑,比如:

其一,对改革开放中的某些发展理念、方式和方法提出质疑。在他们看来,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反映了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收到了良好效果,然而,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出现了不容轻视的社会问题。客观地讲,当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流行的某些理念、方式和方法相关联,比如,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与片面理解“让一部分的人和地方先富起来”的理念就有着紧密关系,而环境问题以及道德滑坡、社会腐败等问题则与曲解邓小平的“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思想有着紧密关系等。

其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怀有某种复杂态度。他们认为,当代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是国家市场经济的胜利,因此中国人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中国人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还不深刻,也没有形成自己的“国家市场经济”理论,即便中国人反复念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今也没有形成权威的、成型的理论,而流行、充斥于中国学术界的市场经济理论基本上是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翻版和摹写,反倒很少深入探讨中国开创的国家市场经济。

尽管四位学者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些理念、方式和方法有过不少批评,但是他们在总体上仍然肯定了邓小平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思想以及“发展是硬道理”“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分步走”“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等思想的正确性,他们认为,这些思想构成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主体内容,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得以成功的思想理论保障。弗兰克还认为,“让一部分有条件的人和地方先富起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理念都具有正确性,但不能片面理解和运用这些理念,否则就会将本来包含了真理成分的理念当成错误的理念。总之,世界体系分析派学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反思性观点,启示人们必须实事求是地、全面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正确的理论,修正错误的观点,大胆地总结经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

第四,探索世界体系视野中的中国道路理论,有助于推进人们合理地把握全球化、现代化、改革开放中的重大问题。

人们知道,在当今世界上,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及其人民对全球化、现代化都怀有美好的愿景,憧憬其美妙的现代化生活,可是有多少发展中国家和人民能够在全球化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圆满地实现这一愿景呢?实际上,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在广泛参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如愿以偿,反倒陷入日益贫穷和无法挽救的现代化陷阱之中。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成功引起了世人的惊异和广泛关注。

中国是现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情复杂;人口众多,生产力水平低;曾经长期遭受战争摧残而陷入“一穷二白”的生存和发展困境中。可是今日中国却只用六十余年时间就取得了现代化发展的巨大成就,打破了西方现代化发展的神话,破除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的“魔咒”,其世界意义极其重大、深远。因此,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许多人想搞清楚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之道。于是,他们深入考察中国的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发展历程,写下了关于中国发展的大量研究成果,比如费正清、郑永年、奈斯比特、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福山以及丁学良等,用“中国通式”成果来陈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之道。问题在于,许多国外学者的判断并非客观、全面、公允,往往陷入偏见和成见之中,要么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归功于中国政府的强力领导(实际上是指“经济专制主义领导”),要么将它归功于吸取和借鉴西方现代化发展的经验和方式(实际上是指“照搬西方模式”),要么将它归功于当代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自主探索——“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是指“试错改革”)等,不难看出,这类判识都只抓住了某个方面,或停留于某个层面,未能走上整体,展开全面考察,因而未能形成“整体主义”判断。

由此来看,世界体系分析派学者的优势恰恰在于拥有“全球主义视野”,正如他们自己所标榜的那样,这一视野是对对象、现实、感性的整体主义理解。其一,探索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与世界现代化发展的联系与区别,揭示了中国现代化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及其重要意义,强调了“中国特色”既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的本质性内容,也是它们取得成功的关键性因素。其二,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对照,揭示后者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走向失败是因为他们的发展建立在照搬别国经验和模式之基础上,而缺乏自主性发展内容。其三,值得注意的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还揭示了这样的事实: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是社会发展能否顺利进行的保障性条件。“稳定压倒一切”。可是许多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都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国内环境,这是他们的现代化发展走向失败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学习中国,需要领会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把“发展与和平是我们时代的主题”落到实处之积极的理念、方式、方法和经验。

总而言之,既然四位学者的中国道路理论具有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是一个重要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那么,国内外学者对这一理论是否有过系统性研究?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时下,国内外学者对中国道路的研究热情非常高,一些学者也注意到沃勒斯坦、阿瑞吉、阿明关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道路)的言论,且做过某种形式的议论,然而这类研究都是不系统的,迄今还没有形成像样的成果。国内外研究力度之不足的原因可能包括:其一,绝大多数研究者对他们的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理论抱有特别的热情和研究兴趣,一时间,人们的注意力、兴奋点都还没有转移到其“中国道路理论”上;其二,四位学者的中国道路理论在表述上显得分散而不易激发人们

的兴奋点。然而,世界体系视野中的中国道路理论及其重要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不会因为人们的忽视就自行隐去。我们坚信,将“世界体系视野中的中国道路理论”课题化,展开系统研究,揭示其理论内容、特征和学术价值,能够为学术界展开广泛研究尽些绵薄之力。

## 二、研究思路

客观地讲,世界体系视野中的中国道路理论是复杂的理论构成体。有学者可能质疑:沃勒斯坦、阿瑞吉、弗兰克和阿明的中国道路理论可以合并在一起研究吗?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作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和最重要代表人物,四位学者的理论具有不可置疑的一致性基础,包括世界体系分析、融入马克思主义元素、批判资本主义、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欠发达、正面看待中国历史及当代中国的发展成就等。至于他们理论间的差异,实际上并不能构成综合性研究的障碍,反倒极可能成为探索这一中国道路理论的个性化内容的重要推力。基于此,根据世界体系视野中的中国道路理论的内在逻辑,我们设计了以下的研究思路:

第一部分,即第一章导论,从总体性层面上系统地考察四位学者在世界体系视野中对“中国道路”的思考的理论内容和学术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辨析“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四个概念的本质内涵及相互关系,进而揭示世界体系视野中的中国道路理论之优势、特色及原创性贡献。

第二部分,从具体性层面上分别探索沃勒斯坦、阿瑞吉、弗兰克、阿明的中国道路理论的个性化内容。第二章着重考察沃勒斯坦对中国道路的研究情况,包括他对封建社会的中国模式、毛泽东时期的中国模式以及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模式所作的理论考察,揭示其理论的创见性内容和学术价值。第三章着重探讨阿瑞吉对中国道路的思考,包括他对中国道路的历史沿革的思考以及对传统国家市场经济模式、现代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及世界意义的思考,揭示其理论的创新内容和学术品质。第四章着重探讨弗兰克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式方法所作的考察,包括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体系类型及历史沿革所作的思考,揭示其特色内容和学术品质。第五章着重探讨阿明的中国道路理论,包括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类型、历史沿革、本质特征的思考,揭示他的理论的合理性、学术价值。

第三部分,即结束语部分,指出四位学者对中国道路的思考的核心问题即新中国六十余年经济社会发展走了什么样的道路问题。基于此,我们在这里考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内涵、形成特征,揭示新中国六十余年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经过几代人的艰苦探索而形成的一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主发展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道路,强调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合理路径。

总之,本书以“具体的总体”思维为指导,站在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层面上考察四位学者的中国道路理论,将总体考察和具体探索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完整的研究思路,系统地揭示四位学者的中国道路理论的内容、特征和学术价值。

## 第二节 四个概念的清理

在本书的讨论中,我们以“中国道路”概念为主题词,统领所有相关内容。这样,可能遭遇某些学者的反对。在他们看来,其一,从使用频率上看,在世界体系分析派理论中,“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中国经验”都比“中国道路”使用频繁,其中,“中国模式”一词出现频率最高,理应选择“中国模式”作为主题词;其二,沃勒斯坦、阿瑞吉、弗兰克和阿明等国外学者着眼于探索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之“秘笈”,感兴趣的是中国经验而不是中国道路。我们认为,这些说法在文字层面说得通,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沃勒斯坦、阿瑞吉、弗兰克和阿明在世界体系视野中考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并非仅仅着眼于所谓“模式”“共识”和“经验”,而是探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之道,揭示其本质性和规律性内容,亦即“中国道路”意义的内容。基于此,我们选择“中国道路”为主题词。为了合理地理解这一选择,我们在这里理清一下“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四个概念的本质内涵及相互关系。

### 一、四个概念的由来

大家知道,“北京共识”一词源于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先生在2004年四、五月间所写的一份研究报告。这

份报告于5月11日以“北京共识”为题发表在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的杂志上。雷默在这篇文章中回顾性地考察了2004年以前的二十多年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分析了这一成就背后的深层根源,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是独特的、成功的,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在于“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并将这种发展模式称为“北京共识”。他强调道:“‘北京共识’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其核心价值正在全世界产生涟漪效应,并将给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希望。”<sup>①</sup>我国学者对雷默先生这篇文章作了如下评价:“《北京共识》的发表拉开了世界对‘中国模式’高度关注的序幕。自此,世界各大主流媒体展开了对‘中国模式’的广泛讨论。”<sup>②</sup>正当国内外学术界热烈争论“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sup>③</sup>时,有学者又将“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引入这场讨论。一部分学者认真思考了雷默的“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说,提出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形成了不少独特的、有价值的经验和方法,但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模式,与其用“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倒不如用“中国经验”显得恰当一些;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既不是所谓“北京共识”的功劳,也不是某个固定模式的结果,而是得益于中国走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

这样一来,“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与“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就在当下学术语境中并存了。问题在于,大多数学者往往在同一意义上互换使用它们。难道这四个概念的含义是一致的吗?实际上,以上四个概念有差异,使用时需要谨慎选择。简单地说,它们出现的时间不同,且各自所指也有区别。

“北京共识”一词的确是乔舒亚·雷默在2004年四五月间率先提出来的,不过雷默的“北京共识”意在说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和方法,

①② 中国人民大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中国模式”问题研究报告》,《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年第9期。

③ 阿里夫·德里克认为,“‘北京共识’之所以能有如此魅力”,一方面得益于“中国政府在多边的协定中的努力使得中国在这个世界上展现出积极面孔,并且赢得了‘北京共识’这样的声誉”;另一方面“还得益于美国现政府滥用其力量导致了美国在全球的声誉下降,同时,其他国家有着寻求新的发展道路的迫切愿望和要求。至于‘北京共识’能否满足他们的愿望则是另外一回事”。(阿里夫·德里克:《“北京共识”:谁承认谁,目的何在?》,俞可平、黄平、谢曙光、高健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10页。)